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三个基本问题研究

沈卫星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013065870

D616
367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三个基本问题研究

沈卫星 著



北航

C1674184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D 616

3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基本问题研究/沈卫星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524-8

I. ①社… II. ①沈…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论-
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4837 号

责任编辑 鲍 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基本问题研究

沈卫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25 插页 4 字数 308,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524-8/D·2302

定价 50.00 元

题 记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 298—299 页

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1949 年以后主要是建设的问题,即如何使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

——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第 4 页

代序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几个问题

崔宜明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显然，这是一次重大的意识形态新提法。那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个新提法具有什么样的内在背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有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得到进一步整合，成为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转型和发展

（一）社会转型、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

以经济体制的转型为基础，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之中，一个在国家行政权力直接控制之外、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由个人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自组织、自协调、自运行的公共生活领域——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早期称之为“市民社会”）——已经初步建立，并且正在发展之中。

这个“社会”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由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

特殊方式,并且由于这种配置方式已知是最有效率的,所以有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也就有了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于是出现了“社会”这个东西,从而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有了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和形形色色的常常是互相矛盾对立的利益诉求。必须强调,这些是在国家行政权力,即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之一是,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既然如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去回答:在现代社会,既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个多元化?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回答应该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既可能是进步和发展的源泉,如果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又是以某些基本的价值共识为基础的;也可能是混乱和毁灭的渊藪,如果我们不能为那些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找到,并且确立基础性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提出因此具有客观的必然基础。

(二) 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要求

在一个稳定的常态社会中,必定存在着某些基本的“价值共识”,所谓一个稳定的常态社会正是以拥有普遍的价值共识为标志的,那么,一个正在全面变革中的转型社会就必然以普遍的价值共识为其追求的基本目标,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各种各样的社会学说正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反过来说,也正是在对普遍价值共识的追求中,包含着对新的社会制度的探索和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想象,包含着对社会共同利益的理解。这也正是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中的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之一。

其实,中国社会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国

绕着“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就处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冲突中,哲学史、思想史上称之为“古今中西之争”。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艰难历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及其矛盾冲突又一次呈现出爆发态势;而不同的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已经找到正确的答案,那么,建立和建设基础性的价值共识就成为新的时代要求,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础性工程。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在调控经济运行、进行社会建设(主要以提供制度供给的方式:包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以及改革和健全法律、教育、卫生等公共性的制度,其次是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政策扶持)之外,还必须解决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其核心就是建立和建设基础性的价值共识,使得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各种各样的道德不仅能够和谐共处,而且成为发展、进步动力的积极力量。这个基础性的价值共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1]

(三) 国家意识形态

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和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基本制度与社会价值共识的共生一致性,也就是社会基本制度是以社会的价值共识为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并且保障和维护着社会的价值共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社会基本制度与社会价值共识的共生一致性还有一个与民族的历史生活传统相调适的问题,而这一切又建立在自1840年以来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基础之上,历史是割不断的。

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根本宗旨,以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现实目标,对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有一个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什么叫作国家意识形态呢?这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国家意识形态应当就是社会基本制度所依据的那些价值原则和为全社会公民所信奉的那些价值观

念。长期以来,我们恐怕不是这样来理解的,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直接把党所持守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当作了国家意识形态。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党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是非常崇高的,所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但也正因如此,党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国家意识形态。

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对其成员是有选择性的,国家则不能选择它的成员;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可以,也应当要求其成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立身之本,国家则不能这样来要求,因为国家的成员叫作“公民”。公民就是国家的主人,是具有充分社会权利的个人,他所享有的社会权利首先就是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的自主权,也就是自我决定的权利。当然,这一权利以不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为界限。“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是党的意识形态,用来要求所有社会公民、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就不合适了。

有一个问题:无论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是道德的要求越高尚越好?不是的,合理的要求应当是在现实具有的水平之上而能有效地引领其向上的那些道德。我们既然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事情,却要求今天的人们应当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水平,这大概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

党的意识形态不能直接当作国家意识形态,既然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是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既然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作为国家的主人和公民有充分的社会权利,既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可能是进步和发展的源泉,如果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又是以某些基本的价值共识为基础的,那么,国家意识形态就只能是为多样的价值观念建立基本的价值共识。这样的价值共识应当既立足于当今社会人们的思想实际,又体现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能够引领社会文明的进步;这样的价值共识应当既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生活智慧和近一百多年来求解放、求发展的历史经验,又表达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灵呼声;这样的价值共识应当既能够支撑起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更成为改革和完善社会基本制度的根本原则。总结起来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2](请注意“尊重”“包容”和“最大限度”这些表述)

其次,就国际关系而言,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能是关起门来说的,必须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性国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展开对话与互动,也就是必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那些积极成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化,但由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差异,更由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主张的冲突也日益频繁和深化。另一方面,不能否认在当今世界存在着普适的价值观念,如民主、法治、正义,以及自由和平等。如果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吸收、阐释和整合这些价值观念方面缺乏更为积极的意识,我们就很难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发展环境,亨廷顿等人的“文明冲突论”就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和谐社会”的标准中,有民主、法治和正义,而和谐与“和谐社会”的主张更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战略转型和发展之中。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要对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正义这五大核心普适性的价值观念有话语权,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突破思想观念的瓶颈,必须在理论水平上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如果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不能充分地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那些最为重要的成果,就不能真正做到“引领社会思潮”。

二、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命题,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等等。这些是应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新变化和发展的对策性命题,还是以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趋势为背景、引领中国社会全面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简单地说,我们是应该把这些命题仅仅理解为“政策”,还是应该理解为体现着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政策总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并且因地、因条件而不断变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则是宏观的、稳定的和指导性的。

我们既然已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我们说这是国家意识形态,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回答这些命题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这里主要是通过具体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内涵来把握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

我们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说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历史地看,我们首先要从理论上搞清楚“和谐社会”。

所谓社会,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变化着的人类生活的不同基本组织方式,即社会形态,如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等,这是广义的理解。另一种是前面说过的,指在国家行政权力直接控制之外、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由个人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自组织、自协调、自运行的公共生活领域,这是狭义的理解。正是为了作出区别,所以黑格尔把狭义的社会称为“市民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组织方式,是现有的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社会形态。为什么要提出“和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所以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3]

通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了适应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必须在国家、政府和社会之间作出整合,和谐社会在根本上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和谐。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当然是狭义的社会,狭义社会的中心就是在配置经济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既然市场、狭义的社会是在政府行政权力直接控制之外、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由个人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自组织、自协调、自运行的公共生活领域,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就存在着如何协调国家(作为主权者、集中体现为立法者)、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核心的、基础性的问题。

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什么样的?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胡锦涛提出了六条标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怎么来理解这些标准呢?这些标准就是价值,和谐社会就是实现了这些价值的社会。怎样才能实现这些价值,把中国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是人与人结合起来共同生活的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力量:基本制度、公共权力和生活在这个联合体中的个人。把中国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从这三个方面来推进。

第一个方面,即社会基本制度建设。

社会基本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它约束着社会性的活动,所有的社会性交往和互动、从政府行政权力的运用到个人的社会行为都受到社会制度的规范,从而保障着社会的基本秩序。而且,社会的基本制度不仅是约束性的,同时还是引导性的,引导着政府权力运用和个人行为的方向,从而决定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或者衰落,也就是命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根据六条标准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以约束所有的社会性活动,把所有的力量引导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地说就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落实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

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些都是基本制度问题,当然还包括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二) 科学发展观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

这里涉及上述第二个方面,即公共权力的建设。

中国是正在社会转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的目标,这就有了怎样来建设的问题,即六条标准怎样转化为、落实为社会基本制度的问题。在历史传统的作用下,改革和完善社会的基本制度主要是由执政党来实施的;那么,对于执政党来说,就需要有一种指导思想、一种价值理念,以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这一指导思想就是科学发展观,它主要是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学说,是怎样改革和完善社会基本制度的思想学说,是怎样运用公共权力才是正确的、合理的和正当的思想学说。

科学发展观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最初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来的,这些确实是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但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其实质就是要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以充分地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为此,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善于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还要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相应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始终是科学发展观的中心内容,如建立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特别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自主创新带动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等,但是科学发展观在根本上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建设,

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其中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社会基本制度。

执政党怎样改革和完善社会基本制度呢?这同样需要有某种价值观念的指导,就是“以人为本”。历史地看,这里的以人为本是相应于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本说的。以上两项工作是充满矛盾张力的非常困难的事情。关键在于,运用权力来建构一套约束权力的好的社会基本制度。一个民族的底气就在这里。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三个方面,即人的问题。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人,是生活在这个联合体中的人。

一个多数人是文盲的社会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建成任何好的社会的。中国人的问题不仅仅是普遍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的问题,随着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认同”的问题越来越重要和深刻。

这样的“社会认同”是在利益关系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是以存在着一个在政府行政权力直接控制之外、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由个人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公共生活领域(社会)为历史背景的问题,是以如何协调国家(作为主权者、集中体现为立法者)、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和社会的关系为目标的问题。(1)解决“社会认同”问题仍然靠行政性力量和手段,靠强迫和灌输是绝对不可能的。(2)这样的“社会认同”综合起来就是,今天的中国必须为全社会公民建立能够为他们所心悦诚服接受的“社会认同”的具体内容。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为今天的中国人(有着复杂的、常常是矛盾的利益诉求,并且有着复杂多样的价值观念)心悦诚服地普遍接受,也就是这是否一种“好”的普遍性的社会认同。所谓“核心”有三项要求:统领性、指导性和区分性,所谓“体系”也有三项要求:完备性、自治性和开放性。这儿仅讨论完备性要求。

完备性,指这个价值观念的体系应当覆盖人们思想意识的主要领

域,才能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指导原则。而且,这个价值观念的体系还应当覆盖社会的主要群体,使得不同思想觉悟、不同精神境界、不同理想追求的人都能在这个价值观念体系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并且都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五项内容。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个人来说,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是需要
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的,至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根
据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世界、指导实践就更需要具有“智慧”。不
可能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知识水平和智慧,实际上也不需要这样——在
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有一批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是自我任命的),才能团结、引领全中国
人民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从个人的发展来说,成为一个真正的、成熟
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人格完善的目标。

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被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真理性学说。
这一理想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由此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张力。这一理
想主要涉及的是社会文明、政治文明。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的社会
认同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可能不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智
慧,可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仍然可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只要他能真诚地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

再次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最充分的体
现者和实现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
中国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想?说到底就是为了民族的振兴。所以,一切具有爱国主义情操、

认同民族复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目标,并且为此努力奋斗的人士,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盟友,是必须团结的进步力量,哪怕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甚至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是否真的能实现,或者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只要他的政治立场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一切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并且具有相应能力的人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力量,民族振兴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情,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情,如果不能团结所有的积极力量,让他们都能投身这一伟大事业,民族复兴就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也许不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智慧,也不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恐怕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大多数;但是只要他爱国,他就具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只要他具有绝大多数人都有的智力水平,在动力机制的作用下,他就有可能在所从事的具体职业岗位上实现创造性的工作。所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证基础,这个基础一定要深厚扎实。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种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内容的理由。

最后是社会主义荣辱观。

所谓荣辱观不是道德规范,即社会生活的道德要求;也不是道德观念,即人们对社会生活道德要求的思想认识,而是道德情感或者说道德情操,是在对社会生活道德要求有着正确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践履道德规范,并且形成相应的动力机制,所以是更加内在的东西和根本性的东西,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具体地说,荣辱观指一个人源于其内心的自我评价心理机制所产生的自豪感和耻辱感,是一个人怎样行为、追求什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问题上的最为强大和根本的心理动力。反过来说,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荣辱观。

自私自利的人就是在占了别人便宜时在内心产生喜悦感、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就不可遏制地感到痛苦的人。如果这个人比较聪明,他知道社会和他人不会赞赏他的喜悦和痛苦,他会把他的情感掩藏起

来,甚至会按照社会所认同的道德要求来为自己的行为掩饰,这就是所谓知行不一。知行不一就是他有不同于社会生活道德要求的一套荣辱观,哪怕对社会生活的道德要求有着非常全面和正确的认识,会信誓旦旦地宣扬他多么赞同和热爱这些道德要求,但是他仍然会基于自己的荣辱观去行为,这就叫作虚伪。

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就是在自己的行为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时在内心产生满足感和自豪感的人,而无论这一行为是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还是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会对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切事情感到痛苦和愤怒,永远不会有意识地去做出损害这样的事情,如果无意中做了,会为此感到极度的耻辱。

我们常常讲道德自律,讲只有以道德要求为动机的行为才是真正道德的,而仅仅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不是真正道德的,也就是孟子讲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4],康德讲的“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5]相应于荣辱观是一个人怎样去行为的动力根据,正确的荣辱观就是践履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的心理根据,真正养成了正确的荣辱观才有所谓道德的自律。

荣辱观是在对社会生活道德要求有着正确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践履道德规范,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动力机制。一个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观念、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最终需要落实为在社会成员中养成相应的荣辱观。否则,言行不一和道德虚伪就会泛滥。八荣八耻就是相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荣辱观。对于一个人来说,具有了这样的荣辱观,就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

以上就是完备性的分析。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而言,一定要真正地理解这一完备性。

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任务和目标,这一目标要求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科学发展观主要是执政党领导全中国人民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学说,是怎样改革和完善社会基本制度的思想学说,是怎样运用公共权力才是正

确的、合理的和正当的思想学说；这一学说指导性的价值观念是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应于“人”的要求，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着什么样的人问题的回答。那么，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这些从不同角度、层次被要求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怎样才能通过进一步的整合和发展，成为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

沈卫星的博士论文做得比较扎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方面内容作了系统的解读，并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线，对这四个方面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给予了有说服力的分析，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创见，或者对已有的研究给予了新的总结。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从整体上看，这篇论文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居于前沿水平。

且为之序，亦有所望焉！

崔宜明

2013年3月

注 释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1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页。

[4] 《孟子·离娄下》。

[5]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